急救，多一种武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渺

死亡突袭时实施无差别打击，不管你是有准备的医生、体格强健的运动员，或是医疗费用充裕的富人。

令人猝不及防的一种，名叫心源性猝死。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报告，中国每年有约55万人死于这把直击心脏的“利刃”。

当它突然张开致命的爪牙时，留给生命反击的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

7月27日上午，武汉东湖步道，一名晨跑者突发心跳骤停倒地，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据报道，这名男性还是一位“急救跑者”，即拥有相关知识、技能，可以在长跑活动中为他人生命提供保障的专业人士。

此前的6月1日，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医生于铁夫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去世，年仅42岁。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发生输入性新冠肺炎疫情，于铁夫是支援医疗队成员之一。去世时，他结束任务不到1周，正在酒店隔离。

就在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正式实施，该法规定：“公共场所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设施。”

在北京华信医院急诊科医生徐海军看来，这些抢命用的“设备、设施”中，有一种很必要。它们体型不大，有椭圆的，有方形的，有翻盖的，也有直板的。它们五颜六色，绝对醒目，最重要的按钮有两个，“一个是开机键，一个是除颤键”。要辨认它们很容易，只需记得三个字母“AED”，它学名叫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以下简称AED）。

对抗心源性猝死，它也许能派上用场。

1

作为一种便携的医疗设备，AED专门用来急救心跳骤停患者。

人的呼吸心跳骤停后，4-6分钟，是进行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在这之后，身体各个器官缺氧缺血，“大脑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

通常所说的心源性猝死，就是在心脏停跳之后，不能向全身重要器官有效供血，最终导致患者死亡。

比起医务人员专用的手动除颤器，AED更加“傻瓜”一点。使用时，有语音提示你下一步怎么做。它还能自动分析患者的心律，给出是否除颤的指令。

美国心脏病协会认为，普通人学会使用AED，比学会心肺复苏技术容易得多。

急诊医生徐海军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使用AED前，先用不到10秒钟，快速判断患者的反应和呼吸情况。使用时，打开电源，根据语音提示，把两块电极片分别贴在患者的右胸上部和左胸外侧。此后继续按照语音提示操作即可。

据徐海军介绍，目前在国内，深圳的每一座地铁站都配备AED设备；杭州市红十字会和杭州市急救中心共同捐赠的30台AED也已经装进杭州地铁1号线的15个站点。徐海军出差时，会专门留意哪些高铁站、飞机场有这种救命的设备。

在美国各城市中，西雅图的心肺复苏成功率最高，通过现场抢救，有44%遭遇心脏骤停的人能够恢复自主心律。2017年，时任美国心脏病协会主席的约翰·华纳心跳骤停，他住的酒店有AED设备，身边的人立即给他实施了心肺复苏，挽救了他。

前北京朝阳区急救中心培训部主任张元春则提到了日本的数据：“日本每10万人拥有超过400台AED，北京常住人口按2000万计算的话，AED数量不够。”

张元春每天出门都会背着AED，但“从没遇上过心跳骤停的患者”。令他感到庆幸的是，被他培训过的学生，用AED救了人。

去年年底，南京禄口机场应急救援部医生余集才在某停车场遇见一例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余集才车上有一台AED，他迅速给患者用上了，等医院的急诊医生赶来。

“上次你给我培训，不是自己从北京带AED过来吗？所以我出去培训都会带一台真机。”余集才向张元春分享这次救人的经历。

“你应该感谢我。”张元春开心得哭了。

深圳火车站一位旅客、南京地铁站一名女子、广州的一名儿童……张元春几乎每天都会留意，社会上又发生了哪些跟急救有关的事例，其中又有哪些是跟AED相关的，他会总结成科普文章发在网上。

7月21日，厦门工人体育馆里，一位市民打完羽毛球，发生心跳骤停。体育馆在此前一周配备了一台AED，患者得到急救，被转送到医院后，如今已经转危为安。

不过，据徐海军解释，在所有的晕倒案例中，只有15%有可能是心脏问题引起的，在这部分人当中，如果有人是心源性心跳骤停，就应该使用AED抢救。当有人突然倒地、心脏骤停时，能有人对其进行“早期的识别和判断”，并且在1分钟之内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并使用AED，那么，“这个人的存活率在90%以上”。

“AED不是万能的，但是如果没有，有些患者肯定没有希望了。有它，最起码25%以上的人很有希望救活。这个比例对于生命来说，就已经很高了。”徐海军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徐海军去饭店吃饭，习惯性地随身带着AED设备。“今天这家餐厅很安全。”他把现场的照片发给朋友，开玩笑地说。

朋友们逗他，别揣着AED去饭店了，应该去马拉松比赛，骑着车，跟着选手。近几年来，AED已经成为马拉松赛事中必备的急救仪器。

还有人给他分享八卦：“网上有个开酒吧的给我留言，我说让他买个AED，那就是全国最安全的酒吧了。”

201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被第四次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12月28日表决通过。

消息传到急救科普人的群体中，有人说“早晚的事情”，有人说“每天都在为此努力”，也有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大家感慨，有了立法支持，AED的普及将“不再是梦”。

“都是张元春、王西富、贾大成老师这样的前辈在努力。”徐海军在群里发言感慨，“慢慢地，AED越来越被重视，将来救活人的消息，也会越来越多。”

他预测，家用版的AED，或许也会很快被研发出来。

2

徐海军感慨，自己要是抱着AED往街上一站，没几个人知道这是什么，更别说会用、敢用了，就算安装、普及了，也可能沦为“摆设”。

“拿去很多大医院问，都没多少会用的。”他说。

两个月前，有媒体在网上做过调查“你会做心肺复苏吗”，9000多人参与了投票，大部分人表示“不太会，只在书本电视上看过”。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发出疑问“AED是啥”。

目前，一台AED设备的价格从1万多元到3万多元不等。贵一点的功能更多，带显示屏，能看到心律，或是可以切换成人和儿童两种档位。

2016年，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突然倒下。视频发到网上，引发了关于加班猝死的讨论，也让很多人开始关注公共场所的急救设备。金波的亲友一起创立了“心唤醒”基金会，一边推广AED设备，一边开展急救培训，张元春也是发起人之一。

当时，北京的大型公共交通枢纽，只有首都机场配备了AED。包括张元春、徐海军在内的许多急救科普人，一直在网上发声，在线下培训讲课，试图推广AED设备。

心唤醒基金会联系北京一家商场，捐赠了一台AED设备，张元春去参加了“落地仪式”，给商场安保部门的员工培训。他注意到，来听课的人里，有不少商场的中层领导。这台AED被放在一层服务台，据张元春了解，安装之后，商场里还没发生过心跳骤停事件。

他曾自掏腰包，给母校前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捐了两台AED，一台放在操场正对面的校医院，另一台放在学校的老干部活动中心，考虑到“运动多风险”。

在医学院里，张元春也进行了AED的使用培训。

“学生们在学校里学的都是基础课，解剖学、病理学、眼科、耳鼻喉科等等，但是没有急救的临床技术。临床技术都在医院里学。”他说。

这些设备装上之后，维护的周期一般是两年。这之后，部分配件和电池可能会过有效期。今年7月，张元春家中的AED设备“滴滴”响个不停，提醒他，电极片该换了。捐出去的那两台他也惦记着，默默计算该去维护的时间。

张元春曾想以个人身份给北京的地铁站捐赠一台AED设备。他在公众号里提到，随后转发到朋友圈。

“我知道急救普及任重道远，但我们总得做些什么吧？”金波去世的第二天，张元春写道。发出来不到2小时，设备问题“首先解决了”。一家企业自掏腰包，买了一台AED给他。

张元春请朋友帮忙联系宋家庄地铁站，那是离他家最近的站点。换乘站，人流量大。他做好了给地铁站员工上课培训的准备。

最终，他得到的答复是需要“统一调度，统一安装，暂时不能接受个人捐赠”。

那台设备最终被他捐给清华大学，装在游泳馆入口处。一进门就能看到，它就搁在一个四四方方的橙色盒子里，贴墙根摆在一只红色箱子上。侧面的“AED”3个字母一眼就能看到。

这台AED还没派上过用场，事实上，张元春捐出去的几台设备，目前都没被使用过。后来他听说，清华大学有校友捐赠了300多台AED，2019年5月7日，其中一台AED设备成功救治了一名大一学生。

3

金波去世将近4年之后，随着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AED真的要进驻他当初倒下的呼家楼地铁站了。

北京地铁公司回应，AED设备的推广安装一直在进行。此前，北京市卫健委就召开过AED工作推进会，要求尽快在火车站、地铁站、交通枢纽等公共交通场所，“解决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等急救设施设备配置问题”。

前不久，心唤醒基金会刚与另一家公益组织合作，给杭州市捐赠了25台AED设备。这些可以救命的仪器，出现在萧山机场、地铁站、主城区的加油站，以及杭州的奥体中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家基金会的急救培训活动，一部分改到了线上。直到3月，今年的第一期实践课才在长沙举办。

6月1日，AED投放被落实的消息，开始出现在媒体上。

山西省发布消息称，今年将在公共场所共计投放500台AED设备，由当地红十字会牵头，首批的200台设备，已经通过验收并投放，同时配套举办了450期心肺复苏及AED相关培训，培训人数达1.25万人次。

“中国很大，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AED的普及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张元春说，“况且真正接受过急救培训的人的比例还不高”。

根据媒体报道的中国红十字会的数据，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接受红十字会系统救护培训的人员是1900万人次，群众救护的普及率不及发达国家。

张元春——总结出AED推行将会面临的困难，最终得出结论，“没有想得那么快”。

他不但关心AED的普及率，还担心这些设备是不是能被使用者迅速拿到。他注意到，南京地铁站的AED设备，需要砸碎柜门玻璃才能取得。他还见过需要扫二维码、刷身份证的取出方式。还有一些地方，取出设备需要找工作人员要钥匙。

张元春记得，在日本见过一家药妆店，AED就放在货架上，需要时，可以被一把拎起，迅速连接到患者身上。

去年11月某夜，35岁的演员高以翔在录制电视节目时心跳骤停，抢救无效去世。在这之前，途牛旅游网副总经理李波、春雨医生的创始人张锐，都因心肌梗塞离世。

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抽烟喝酒、过度劳累，乃至强烈的负面情绪，都是可能导致猝死的危险因素。还有更多普通人，奔行在上下班的路上，或是坐在加班的工位熬夜，用咖啡“续命”。

张元春给很多单位做过急救培训，发现有不少都是单位希望做、领导希望做，可员工态度敷衍，参加培训时“态度不端正”，甚至在考核的时候作弊。

张元春甚至被这些事气哭过：“我真的不能接受这种对生命不尊重的态度。”大家要“会用，敢出手相救”，才能避免更多悲剧发生。“虽然进行心肺复苏不是万能的，但不救，人肯定活不了。”

成都一景区安装的AED设备。贾大成/摄

清华大学游泳馆入口处，门内可见AED设备。张元春/摄

她应该

□ 刘 言

日前，广东佛山南海的派出所民警接到了一个特殊的报警电话。报警人是一名女子，她称自己的女儿在商场偷了别人的东西。

“是谁报的案？这么小的小朋友怎么回事？”赶到现场后，民警意外地见到一个7岁半的小女孩。原来，小女孩之前在这家商店里偷拿价值200多元的玩具，被监控拍了下来。这次她经过商店时，店员认出了她。

不管店员怎么询问，小女孩始终不承认此前的行为。店员只能通过孩子随身携带的电话手表打给她的父母。不久，小女孩的母亲来到现场。她没有打骂孩子，一直平静地询问。小姑娘还是不吭声，也不肯承认拿了东西没给钱。最终，女孩的妈妈选择报警。

孩子不停地哭，民警便让她妈妈和周围群众离开她的视线，然后进行安慰和劝说。“我问她犯罪这个事情听说过没有？她说听过。”“我说坐牢听过没，她说也听过。我告诉她，你知不知道做偷窃这种违法的事情是要坐牢的，严重的话是犯罪行为。”

当民警说坐牢等于关“小黑屋”后，小女孩终于哭着承认了，她某天路过时看到玩具很漂亮，但也了解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意思跟妈妈开口要钱，一时没忍住就偷偷拿走了几个。这天她再次路过商店，被店员逮个正着。

女孩妈妈按照店里的商品价格进行赔付，警察也对小女孩进行了批评教育，相关的新闻报道迅速登上热搜榜。有网友认为，“妈妈好样的，是最好的榜样”；也有人觉得，“这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这种情况也报警？有点浪费公共资源”。女孩妈妈表示，她之前在网上看到，有父亲用这种方法教育偷拿东西的女儿，希望给孩子一个教训。

类似的新闻曾经多次上演，比如重庆一个7岁女孩成“惯偷”，母亲报警希望民警假装将女儿“关几天”以震慑；山东滨州一11岁小男孩经常在学校偷拿同学的东西，还谎称是捡到的，父母无奈报警求助。

这样的报警真的是浪费社会资源吗？尽管案值不大，小女孩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处以拘留或罚款。当然，法律也规定，不满十四周岁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网友对小女孩心理问题的担忧也不无道理。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和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曾在节目中分析，10岁以下少年的偷拿行为，只是早期不良行为，并不一定发展到盗窃的程度，往往还是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如果让很多人知道，这个孩子可能丧失自尊，而一个小小的过错搞得人尽皆知，因此丧失自尊的话，孩子很可能会破罐子破摔，由此堕落，行为发展到更加严重的程度。

她建议，家长在处理时首先应该让孩子回避，把孩子带回家去，家长则留在现场问清情况解决问题，回家再询问孩子怎么回事。对于孩子的错误，应该给孩子留一个空间，让他自己说错在哪儿，以后应该怎么做。当孩子明白这个道理，他才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在这个事件中，民警的处理也显得专业而克制，先是疏散了周边的群众，非常默契地配合着妈妈教育小女孩，不是吓唬她，而是劝慰和教育。

事实上，类似的事件中，父母报警也往往是由于教育方式失灵，不得不求助警方。民警的身份有威慑力，教育孩子往往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7岁小女孩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家长应该履行监护责任。从未成年的人的成长上看，类似行为的规范也往往更需要家庭的正确教导。

李玫瑾曾在节目中介绍，杜绝类似情况的方式，在于早期父母给孩子灌输观念的行为是否做到位了。她曾经在街上碰到一位母亲，一边抱着孩子一边说：“下次咱们去别人家的时候，不要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因为那是别人家，要有吃的，得人家阿姨给你才能吃，你不能自己去拿。玩具也是，走的时候不能带走。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咱们自己家，是别人家。你要觉得好，想要的话，你告诉妈妈，妈妈回来给你买，记住了没有。”

第一次带孩子出去玩、孩子什么都不懂时，妈妈讲的话实际上给孩子形成一种观念——东西是有你我之分的。这种观念是后天形成的，但是不知不觉对人们发生着影响。

父母是子女最好的老师。在没有给女儿养成好的观念、她已经犯下错误的情况下，这位妈妈请来了警察叔叔，配合威严的制服和执法环境，现场进行生动的普法教育，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起码，比起将“C10orf67基因”研究成果拿给孩子评奖、偷窃他人原本能凭真才实学得到的荣誉的父母，她能够明确地告诉孩子，偷窃，是不对的。

生娃何用

□ 李雅娟

一个在羊水里泡得皱巴巴的“小老头”，如今小腿儿一撒开就窜出几米。一个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耳旁：“什么时候生二孩？”

这真是现代版的灵魂拷问——同事问，朋友问，亲戚问。

二孩？一孩就消耗我父母两个“壮劳力”，二孩我可没勇气。

与此同时，我脑中却冒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非生不可？养娃到底有啥用？”

产前检查、生产，保守估计1万元；头3年散养，衣服、鞋子、玩具捡哥哥姐姐的，费用姑且算0元；幼儿园3年，再接受小中大学的16年普通全日制教育，在不上昂贵的课外班、不参加补习的情况下，也得有几十万元吧。

到那时，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女性，能从孩子那儿得到什么呢？

《柳叶刀》近期发表了一篇预测人口数量的文章，华盛顿大学健康测量与评估研究所的团队预测，到2050年，将有151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即保持人口不增不减）；到2100年，中国人口预计降到7.3亿。

这些年来，欧美人口学家从税收及福利水平、地缘政治、综合国力等方面论述多生孩子的好处。但人口增长曲线可不听使唤，越来越平缓，而且加入低生育率行列的国家、地区越来越多。看来跟我一样偷偷摁计算器的人不在少数。

在避孕药具廉价易得的地区，生娃与否，早就从听天由命变成了一个接一个的选择题：要不要生？什么时候生？生在哪儿？这年头，养小孩真的是一项投资周期极为漫长、收益率又极不确定的庞大工程。

在工业生产尚不发达的年代，小孩还能派上些许用场，这在文学作品里也可见一斑：童话故事《小红帽》里，年幼无知的小姑娘独自穿过危险的森林给外婆送点心；小说《红楼梦》里，八九岁的小道士、十来岁的小戏子为了谋生而来到贾府，他们学会念几句经文、会唱几首拿手的曲子，算是有了吃饭的资本，有人还得拿月钱供养父母。

在我父亲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山东农村，四五岁的小孩得负责照看弟弟妹妹，七八岁的小孩要放羊、捡柴禾，十一二岁的小孩就是正儿八经的劳动力了。北方冬天的清晨，天寒地冻，只有被窝里有点热乎气儿，我父亲那时候不到10岁，就被大人从被窝里拎起来去拔草。

到了今天，小孩的用处可就另当别论了。

美国一名学者曾考察了现代教育制度兴起的历史，他发现：随着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分工细化、专业门槛增加，仅靠体力就能完成的工作越来越少。要想在现代社会谋一个饭碗，青少年就不得不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

再加上近年来文凭的“通货膨胀”越发严重，整个社会的平均学历水平提升，培养一名合格劳动力的时间一再延长。父母想要收回养娃的成本，可就越来越难了。

以我为例。硕士毕业工作了五六年，给父母的物质回报，恐怕连支付大学4年的开销都不够。也许有人说，孩子可以带来精神慰藉，而我从高中至今，已经在外漂了十来年，眼看还会继续漂下去；同学和同事也多半漂着，每年回家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我给父母最大的“回报”，恐怕就是这个满地乱跑的外孙了，于是，他们刚跑完孩子的教育马拉松，又投入养育孙辈的漫漫征程。

言归正传，前述那篇耗费了二十几位博士心血的论文，顺便以科学论证阐述了一个常识：越富裕的国家或地区，生育率越低；生育率降低，与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有关。

人啊，总是操心个不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人口爆炸理论盛行一时。彼时世界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恢复生机，在那次席卷亚欧非大陆的世界大战中，几千万人失去生命。战后人们刚投入生儿育女的事业20来年，这一理论就描述了生育的可怕前景——人口增长速度太快了，未来人口数量会超过地球的承受能力，如果不加控制，人们将耗光地球上的资源，走进世界末日。就连小学生写作文，也忍不住担忧“最后一滴水是人类的眼泪”。

最近20年来，这种理论渐渐式微，发达地区的人们又为人口增长过缓而担忧：生孩子少了，劳动力和纳税人就少了，社会福利体系怎么撑得下去呢？前述华盛顿大学的研究者在论文中给未来的国家指了条捷径：广收移民。

以前看过一组数据，欧美地区没有实施过计划生育政策，但独生子女比例依然攀升。看吧，为生二孩而纠结的我，只是历史洪流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水分子而已。

也不能怪人们不爱生孩子，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小孩越来越“没用”了，他们不仅不能产生收益，还格外费钱——市面上的各种商品、服务，只要加上“婴儿”“儿童”之类的字眼，就跟镀了金镶了钻似的，价格翻好几倍。“销金兽”的名头，不是白得的。

当然，光烧钱还不够，智力和脾性也会在跟小孩斗智斗勇中得到磨练。表哥才30岁出头，因为孩子不好好学习，血压噌噌往上蹿。

说了这么多，养娃又费钱又操心，何苦来哉？

七八年前，我20岁出头，以为自己面前铺排着无限可能。“孩子”这种俗物？千万要不得。

后来，我有了一个脾气暴躁又黏人的小孩，早已忘了当年的雄心壮志，只惦记着下顿饭给这家伙弄点什么新鲜花样。我买翻译的绘本、进口的奶粉、广西的芒果无锡的桃。我穿衣服一向很应付，却给他挑选配了假领带、小马甲的幼儿西装。

有时候，想想未来觉得亏得慌。可是，眼看他摇摇晃晃地跑过来，一张晒黑的小圆脸挤到我脸前：“妈妈，我吃那个！”脑袋里摁了半天的计算器，一股脑儿消散了。

嗐，所以，生孩子到底值不值呢？我也说不清。